

中國革命史 參考資料精選

(下)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选编组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

(下)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选编组

梁余主编

参编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忠群 李一平

高燕丽 彭运卿

重庆大学出版社

DK17/2 8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下)
《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选编组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字数：233 千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制

印数：1—6000

标准书号：ISBN 7-5624-0121-7 定价：1.85元
K·5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下册)

(接上册六、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刘伯承 回顾长征	(1)
陈 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14)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节选)	(22)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23)
梁漱溟 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节选)	(39)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44)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坚持消灭革命力量的反动言论摘录	(49)
训政纲领	(55)

七、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57)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58)
蒋介石庐山谈话	(61)
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64)
蒋介石对中共宣言的谈话	(67)
宋庆龄 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69)
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69)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	(73)
章乃器 少号召 多建议	(74)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	(76)
毛泽东 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 指示(节选)	(77)
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78)
毛泽东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79)
日本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 ——第二次近卫声明	(82)
日本政府第三次近卫声明	(84)
汪精卫投敌“艳电”	(85)
汪精卫 举一个例(节选)	(87)
国民党密订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节选)	(92)
国民党密订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节选)	(95)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 对时局宣言	(103)
中央对时局指示	(108)
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 (节选)	(109)
张君劢 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	(111)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复何应钦、 白崇禧佳电	(115)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节选)	(119)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令	(120)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121)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124)
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 公函	(125)

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

中的讲话(节选)	(126)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节选)	(128)
国民党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文告	(129)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节选)	(130)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	(13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	(134)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节选)	(135)
关于国共谈判林祖涵同志报告全文	(137)
周恩来 如何解决	(144)
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155)
赫尔利将军来华的使命	(157)
新华社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58)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162)
雅尔塔协定	(163)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164)
苏联对日宣战	(166)
延安总部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号 命令	(167)
停战诏书	(171)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173)

八、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177)
蒋介石给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 电报	(179)
蒋介石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	(180)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节选)	(180)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	(181)
蒋介石致毛泽东同志的三封电报	(184)
毛泽东同志复蒋介石的三封电报	(186)
蒋介石先生来电读后	(187)
毛泽东抵渝飞机场的谈话	(196)
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	(190)
蒋介石对日降军第一号令(节选)	(191)
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目前时局发表谈话	(193)
新华社记者评美军将在天津登陆事	(195)
毛泽东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	(196)
双十协定	(199)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 报告(节选)	(204)
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反对内战的谈话	(207)
中国第三党对时局宣言	(209)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节选)	(212)
中共中央代表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致国民党政府 代表的三项提议	(215)
莫斯科三强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部分	(216)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 协议的谈话	(217)
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之协议	(218)
和平建国纲领(节选)	(219)
国民党二中全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 决议	(222)
中共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	(2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	

的指示	(225)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节选)	(231)
中共中央声明决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	(241)
施复亮 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节选)	(242)
中国土地法大纲	(246)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	(25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	(251)
美帝援蒋初步统计	(262)
各民主党派联合告国内外同胞书	(267)
蒋介石新年文告	(269)
中共发言人对和谈问题发表谈话	(272)
九、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节选)	(277)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斗争(节选)	(282)
李富春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报告(节选)	(291)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 决议(节选)	(30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 决议(节选)	(312)
后记	(322)

回 顾 长 征

刘伯承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

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

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

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

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迫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

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在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

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平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平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平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

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踏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达维、懋功（今小金）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四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六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